

# 中國文化研究 通訊

Newsletter on Chinese Cultural Study

2021 年第 4 期

总第 20 期

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基地

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主办

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创新智库

西北大学黄帝文化研究院

## 顾问

张岂之 王亚杰

郭立宏 常江

## 主编

李浩

## 执行主编

张海青 赵杭

## 责任编辑

陈战峰 王早娟

刘晓宇 刘晓

王晨佳 郭琳

## 封面题字

袁行霈

## ◆ 工作简讯

中心举行“海外中国书系·日本学者唐代文化研究译丛”出版

项目签约仪式 /2

黄帝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在西北大学举行 /3

## ◆ 专家观点

刘再复 《李泽厚美学概论》序言(摘编) /5

王子今 太史公笔下“鼠”的故事 /7

吴寒 明清人迹路程图中的文天祥记忆 /12

## ◆ 学术平台巡礼

西北大学黄帝文化研究院 /20

## ◆ 学者风采

历史学家——王子今 /22

文学专家——蒋寅 /24

## ◆ 新书推介

《丝路·长安国际译丛》 /26

《黄帝世系及其神话传说研究》 /28

## 中心举行“海外中国书系·日本学者唐代文化研究译丛”出版项目签约仪式

2021年11月22日，“海外中国书系·日本学者唐代文化研究译丛”出版项目签约仪式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举行。该书系由日本著名杜甫研究专家、日本专修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特任教授、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点博士生导师松原朗教授担任日方主编，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李浩教授担任中方总主编，西北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高兵兵教授担任中方执行主编。由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牵头，组织各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本书系进行译介。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张炜、陕西教育厅副厅长高岭、西北大学副校长吴振磊、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宋亚萍、陕西人民出版社社长

赵小峰、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教授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日方主编松原朗通过视频对书系的出版表达了深切期望。中方主编李浩等专家学者也发表致辞，表示将进一步积极开展与域外学界的交流合作，为推动中华文化交流与发展做出贡献。其他与会学者对书系的出版也表达了期待。

书系体现并代表了当代日本学界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对推动中国文化研究学术成果交流与发展，展现中国文化的海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该书系的译介呈现了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的学界动态，勾勒了汉文化播迁的轨迹，丰富了相关领域研究的学术史资源。这些作品中文版的面世，必将搭建起文化沟通的桥梁，实现中外学术研究成果的互学互鉴。



## 黄帝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在西北大学举行



2021年12月8日上午，黄帝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暨首届黄帝文化论坛在我校长安校区举行。陕西省副省长方光华为本次活动发来贺信。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黄帝陵基金会理事长、黄帝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白阿莹，我校党委书记王亚杰，校长郭立宏，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田明纲，中心主任、黄帝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李浩教授，中心副主任、黄帝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赵杭以及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仪式。仪式由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吴振磊主持。

大会宣读了关于成立黄帝文化研究院的文件，为“黄帝文化研究院”揭牌，并为黄帝文化研

究院首届学术委员会暨首批特聘研究员颁发了聘书，发布了2022年首届《黄帝陵基金黄帝文化研究专项课题指南》。王震中、赵世超教授分别作了题为“黄帝时期即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时期”和“黄帝的国家祭祀研究”的主旨报告。

方光华在贺信中向西北大学黄帝文化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他指出，黄帝过去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将来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光辉旗帜。黄帝所开创的中华政治文明，所形成的中华思辨传统，所开拓的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道路，将永远为我们提供精神指引。他表示，新时代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时代，我们要共同努力，增进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把黄帝陵祭典谱写为中华文明的赞美诗。他强调，要畅通民族血脉，焕发民族精神，让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进步提供更强大的精神动力。

郭立宏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黄帝文化中吸取养分，不断弘扬黄帝文化精神。长期以来，学校注重对中国文化尤其是黄帝文化的研究，张岂之先生、谢阳举教授、李浩教授的团队已在该领域推出了具有重大影响力学术成果，学校在该领域的研究基础、研究团队、研究能力和研究影响，已在国内享有盛誉。黄帝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将进一步推动黄帝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他强调，学校将以此为契机，在各方面予以充分保障，为研究院工作开展保驾护航，为增进中华文化共同体认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助益，为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作出西大贡献。

白阿莹在讲话中谈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在探究历史规律中掌握历史主动，增强执政本领，凝聚智慧力量，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他指出，西北大学一直以来重视对包括黄帝文化与黄帝精神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传承与创新，在研究黄帝文化方面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推进黄帝文化研究，为赓续中华文化血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

黄帝文化研究院是在黄帝陵基金会支持下，由我校成立的实体研究机构，旨在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标识，推动黄帝文化研究广泛深入地发展。研究院的主要职责包括：拓展和深化有关黄帝文化的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田野调查及研究阐释工作；联合相关政府部门与专门科研机构，围绕黄帝文化设立专项课题，搭建科研平台；负责组织策划黄帝文化学术交流，开展黄帝文化教育普及工作；研究编撰黄帝文化相关研究成果，编撰出版相关学术论文集，推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 《李泽厚美学概论》序言(摘编)

刘再复

2006年上半年，我接受东海大学程海东校长和该校中文系主任王建生教授的邀请，担任讲座教授。此次讲座，艺术系师生和中文系研究生全部参加，座无虚席，反响热烈，好几位老师同学告诉我，想不到李泽厚先生的美学学说如此新鲜、如此富有原创性与体系性。他们还说，除了明了李泽厚美学本身的丰富内涵之外，还有两点让他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一是李泽厚既通西方哲学，又通中国哲学，因此，他的美学体系，真的是打通中西文化血脉，一切论述均是融会贯通后的表述。二是李泽厚先生的学术方法，不是寻找孤本秘籍的小证方法，而是点石成金的大证方法，即在基本事实中发现真理的方法。听到老师同学们的反应，我很高兴，大约受到他们的鼓舞，回到美国后我便整理成章。

我身边的好几位挚友，都是当代中国与人类世界的天纵之才。李泽厚是其中的一个，无论他是在哲学所（文学所附近）还是在美国落基山下（我家附近），我都深知他精神创造的价值，都在口里叫他“泽厚兄”时心里敬他为自己的老师，“兄长”与“师长”融合为一。1996年，我在《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中如此称呼他并郑重评价他为中国大陆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第一小提琴手”，没想到，我的评价和我的称呼竟遭许多攻击，说我不免太贬低了自己。对此，我写了《我的骄傲》一文予以回答。其中一段如是说：

我把李泽厚当做“师长”，不是我的谦虚，而

是我的骄傲，不是我的自我贬抑，而是我的自我肯定。不用说李泽厚这样杰出的思想家，即使是一些普通的作家诗人，只要我能从他们的文字中得益，我也把他们视为老师。不耻相师，在少年时代我就懂得这一道理。我记得出生于智利的大诗人聂鲁达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把所有的诗人都称作我的老师，这不是我的谦虚，恰恰是我的骄傲，因为要不是我熟读了在我们国土上以及在诗歌的所有领域写下的这一切佳作，哪里会有我今天的一切。”这是他就任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学术委员时在演讲中说的话，这句话在我心中共鸣了很久，而且使我知道他为什么会成为伟大的诗人。知道一个伟大的诗人在知识面前总有一种永恒的谦卑，并且把这种谦卑视为骄傲。

十几年前所作的“第一小提琴手”的评价，今天我仍然坚持。当年我从“学问”、“思想”、“文采”三者统一的价值尺度上去衡量人文科学，觉得他是三者统一的范例。人文科学似乎无需文采，但是他的《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的历史论述，却那么富有诗意，客观历史与主观感受乃至人生慨叹那么相融相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文异象。李泽厚美学的原创性，包括他的表述文体也是原创的，这也许正是《美的历程》一版再版、经久不衰的原因。严复说，中国学人重博雅、夸多识，西方学人则重新知、重见解。的确如此，所以我也不用博雅多识作为价值尺规观看人文科学。那么，如果以思想见解为学衡标准，说李泽厚为中国美

学的第一小提琴手，应当不足为怪了。1988年，法国国际哲学院的院士们进行每一年度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三位当代世界上最杰出的哲学家。这一年，李泽厚被选上了。我为此高兴了好久，但没有一家报刊作出报道。最后，我只好请求香港《文汇报》的记者刘锐绍先生帮忙，他才写了一则通讯记载此事。20世纪下半叶，被投票选上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的只有李泽厚一人，我提及此事，并非“崇洋媚外”，而是想说明，我的评价尺度与远方的匿名选举者差不多。

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在出国后的二十年里能不断向泽厚兄学习和求教。历史把我们抛到一起，抛到落基山下的一个叫做博尔德(Boulder)的小城里，让我们可以常常一起散步，一起沐浴高原的灿烂阳光，一起领略人间精彩的智慧。真理多么美呵，智慧多么美呵，我常独自感叹。如果不是漂流到海外，如果不是离李泽厚先生这么近，我真不知道他除了具有天分之外，还如此“手不释卷”，如此勤奋；也不知道 he 除了对哲学、思想史、美学、文学深有研究之外，还对古今中外的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具有如此深刻的见解。这才使我明白哲学家对世界、对人生见解

的深度来自他们涉猎的广度。李泽厚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阅读，只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写作，这种比例启发我更广泛地阅读，从而也使我更明白他的美学深渊具有怎样的奥秘以及他的美学语言为什么是眼界狭窄的美学家所书写不出来的。

编写好此书后，我突然升起一个念头，想把李泽厚《关于“美育代宗教”的杂谈答问》收入我的书中。这一答问录写于去年，是他宣布“封笔”前最后的作品，又是他对自己的美学观所作的总结性的精心之作。思、诗、史熔为一炉且不说，其思想的密度真让我惊讶。一年来，我读了不知多少遍，此次一说想把它拿来“增色”，他立即答应。那么，除了感谢泽厚兄之外我要对读者说：我的概论，你们可以不读，但李先生的这篇答问则非读不可，那可是他自言自语出来的“李泽厚美学概论”。(2009年3月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图书馆阅览室)

(本文原载《李泽厚美学概论》，三联书店，2009年。  
刘再复：当代著名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等职。)

# 太史公笔下“鼠”的故事

王子今

云梦睡虎地和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代简牍文书中,都有民间日常选择时日吉凶的用书《日书》。睡虎地秦简《日书》和放马滩秦简《日书》中都可以看到用以纪时和占卜的十二种动物。这十二种动物有时与十二地支对应,类同后来的十二生肖。有人认为,或许可以看作后世十二生肖的雏形。两种战国秦代《日书》中的十二种动物和后来的十二生肖并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有“鼠”与地支“子”相互对应。在《史记》成书之前,“鼠”已经进入社会纪年方式之中。作为博闻多智的历史学者,司马迁当然熟悉相关的知识。

由于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学界存在争议。我们现在还不能确知他的生命过程经历了几个“鼠”年。但是我们读《史记》,体味其中有关“鼠”的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 一、地名记忆“鸟鼠”“鸟鼠山”“区鼠”

《史记》的第二篇,《史记》卷二《夏本纪》中引录了中国早期地理学文献《禹贡》。《禹贡》标榜夏禹,论说天下人口分布、物产资源与入贡中央的交通路径。《禹贡》列入《尚书》,被看作儒学经典。据史念海先生考察,《禹贡》成书在战国时,应当是当时魏国学者著述,体现了梁惠王追求霸业的雄心。所表现的理念,是“要象夏禹那样协和万邦,四海会同”,这当然也与实现大一统局面的理想有关。《禹贡》说到雍州地形,其山脉有“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汉代学者孔安国解释:“西倾、朱圉,在积石以东。鸟鼠,渭水所出,在陇

西之西。”关于“朱圉”,李学勤先生经实地考察,发表了《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有精彩的论述。“鸟鼠”,是西北地方常见的野生动物。《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介绍匈奴儿童的生存能力训练“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体现了这一情形。

关于对周秦崛起,影响中国历史走向发生重要作用的“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地方,《史记》卷二《夏本纪》的相关文字,注家有很多解说。其中可以看到有关“鸟鼠”“鸟鼠山”“鸟鼠同穴”“鸟鼠同穴之山”的文字。孔安国说:“鸟鼠共为雌雄同穴处,此山遂名鸟鼠,渭水出焉。”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山海经》已经出现“鸟鼠同穴之山”的说法。而郭璞《山海经图》有《飞鼠赞》,说到会飞翔的“鼠”:“或以尾翔,或以鬚凌。飞鸣鼓翰,倏然背腾。固无常所,唯神所凭。”我们读《史记》说到的“鸟鼠”“鸟鼠同穴”,是会联想到近期大家都关心的一种野生动物“蝙蝠”的。《初学记》卷二九关于“鼠”的主题之下,说到“鼯鼠夷由”:“似蝙蝠,肉翅,飞且乳。”指出这是一种会飞翔的哺乳动物。又引郑氏《玄中记》说:“百岁之鼠,化为蝙蝠。”

大概当时人们的动物学知识中,有关“鼠”和“蝙蝠”的关系并不十分明了。于是有“百岁之鼠”“唯神所凭”的理解。但是秦汉社会生活中“鼠”的多种形式的介入,在《史记》中是可以看到反映的。

地名往往可以保留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以“鼠”字作为地方标志性符号，应该有特殊的涵义。除“鸟鼠”外，《史记》中还可以看到“区鼠”地名。《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赵)与韩会区鼠。”《史记·赵世家》：“与韩会于区鼠。”《史记》卷四五《韩世家》：“与赵会区鼠。”“魏会区鼠。”看来“区鼠”应当是三晋地方。这一地名“鼠”字的意义，我们已经不能清楚解说。《战国策·齐策第三》出现“淄鼠”地名，高诱注以为“赵邑”。民国学者金正炜《战国策补释》卷三写道：“‘淄鼠’疑即‘区鼠’。”“‘区’‘淄’音近而歧。”这样的意见，可以参考。不过，无论是“区鼠”还是“淄鼠”，《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都没有著录，其空间位置不能知晓，地名由来也难以探究。

## 二、“鱼鳖鸟鼠，观其所处”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有一段话讲天地万象的自然演进和生息变迁：“天开县物，地动坼绝。山崩及徙，川塞溪塉；水澹地长，泽竭见象。城郭门闾，闺臬橐枯；宫庙邸第，人民所次。谣俗车服，观民饮食。五谷草木，观其所属。仓府厩库，四通之路。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地貌形态和天候变迁等环境条件，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等世态风景，生产与经营，情感与信仰，都在天人之际的复杂关系之中生成与变易。

其中“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说到与人类生产生活相关的动物。大致可以理解，“禽兽”和“鱼鳖鸟鼠”，是说野生动物。这里应当说明，“动物”这一生物学概念，《史记》已经使用。《史记》第一篇，卷一《五帝本纪》说“黄帝之孙”，帝颛顼高阳“制义治气以教化”，同时“絜诚以祭祀”，取得了成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

阸，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关于所谓“动静之物”，张守节《正义》解释说：“动物谓鸟兽之类，静物谓草木之类。”前者我们今天仍然称“动物”，后者则称“植物”。

其实，《周礼·地官·大司徒》已经使用了“动物”和“植物”这样的语汇：“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穀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荑物，其民哲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蠃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我们在这里不讨论“五地”即五种不同地理条件具体的野生动物分布和植被形态以及居民的生性，主要关注和现今生物学术语一致的“动物”“植物”概念的最初生成。

正史使用“动物”“植物”语汇，最早见于《后汉书·马融传》载录马融的《广成颂》。而“动物”“植物”统说的，则见于《宋书·符瑞志上》：“(圣人)能君四海而役万物，使动植之类，莫不各得其所。”但是许多迹象表明，在司马迁的知识结构中，已经有对“动植之类”即如前引《史记》卷二七《天官书》中所说的“六畜禽兽”和“五谷草木”的分别关注。所谓“鱼鳖鸟鼠”中的“鼠”，因为有与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密切相关的活跃表现，自然早已进入这位史学家的视野。

《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说，叔孙通曾经以“鼠窃狗盗”蔑称反秦的暴动民众“群盗”，可知“鼠”在日常生活中造成的危害，是人们都熟悉的。广州汉墓出土的陶灶模型，有鼠在灶台左近活动的形象。四川崖墓发现的石刻画像，有蹲

坐的犬口衔鼠的画面，有人称作“狗咬耗子”。内蒙古汉墓出土陶仓，多以彩绘或堆塑方式制作成鸮的形象。有人认为这是欲借用鼠的天敌的威慑力镇伏鼠患对粮食储备的危害。河西汉墓出土木雕动物形象，有人称作“木虎”，有人称作“木猫”。虎也是猫科动物。这种文物遗存也许有益于探讨猫的驯宠的历史。汉代遗址猫骨的出土，也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艺文类聚》卷九三引《东方朔传》有这样一段文字，说骠骑将军霍去病责难诸博士，东方朔予以机智的回答：“干将莫耶，天下之利剑也。水断鹄雁，陆断马牛。将以补履，曾不如一钱之锥。骐骥騄耳，天下之良马也。将以捕鼠于深堂，曾不如跛猫。”如果这一记载可信，那么，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了以“猫”“捕鼠”的克服鼠患的方式。

### 三、赵奢的比喻：两鼠斗于穴中

对于战国时期的军事史记录，《史记》多有生动的文字传世。赵国名将赵奢论战，曾经以“鼠”比喻。《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写道，“秦伐韩，军于阏与。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召乐乘而问焉，乐乘对如廉颇言。又召问赵奢，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赵奢是在面对勇悍的秦远征军的临战形势下说这番话的，所谓“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体现出决战决胜的英雄主义气概。

对这次战役的记述，《史记》卷五《秦本纪》写道：“(秦昭襄王)三十八年，中更胡阳攻赵阏与，不能取。”《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记载：“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阏与下，赐号为马服君。”《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也说：“赵奢破

秦军阏与下。”

战国时期的天下形势，如《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所记述，“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横，驰车击毂，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愬”，又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所说，“伏尸百万，流血漂卤”。所谓“诸侯争强，战国并起，甲兵不休”（《盐铁论·未通》），强调了当时战争的激烈。赵奢以“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比喻战场形势。“两鼠斗于穴中”，生动地形容“道远险狭”，作战艰难。《史记》保留了一个勇敢军人体现“战国构兵，更相吞灭，专以争强攻取为务”（《中论》卷下《历数》）之时代精神的生动鲜活的语言史料，值得我们珍视。而其中有关“鼠”的文字，说明对话双方赵奢、赵惠文王，以及太史公本人，都是熟悉这种动物的生活习性的。人们日常知识中对“鼠”的活动特点的了解，还体现于《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述的语言“首鼠两端”。

我们在汉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的《盈不足》部分看到有这样一道算题：“今有垣厚五尺，两鼠对穿。大鼠日一尺，小鼠亦日一尺。大鼠日自倍，小鼠日自半。问几何日相逢？各穿几何？”答曰：二日、十七分日之二。大鼠穿三尺四寸、十七分寸之十二，小鼠穿一尺五寸、十七分寸之五。术曰：假令二日，不足五寸。令之三日，有余三尺七寸半。”说两只老鼠迎向穿穴，要打通厚五尺的墙垣，“大鼠”的进度是一天一尺，第二天速度会加倍。“小鼠”的进度也是一天一尺，但是效率会逐日减半。问：多少天两只老鼠会相遇，各自掘进的尺度是多少。答曰：二日又十七分之二日两只老鼠可以会师。届时“大鼠”穿三尺四又十七分之十二寸，“小鼠”穿一尺五又十七分之五寸。

这一算题的设定,体现当时人们对“鼠”“穿”“垣”的情形是相当熟悉的。所谓“大鼠日自倍,小鼠日自半”,说明人们对“鼠”的“穿”“垣”能力的观察非常细致。而“垣厚五尺,两鼠对穿”,在穴中“相逢”时刻,和赵奢所说“两鼠斗于穴中”的场景,还是有几分相似的。

#### 四、李斯的人生启示“厕中鼠”与“仓中鼠”

秦王朝名相李斯,是为秦实现统一以及秦帝国的行政建设多有贡献的政治家。他在狱中上书秦二世,自陈“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有“罪七”,实际上自述七个方面“有功”的政治表现。其中第一条就是“兼六国”,“立秦为天子”。李贽曾经评价他和秦始皇共同设计的秦的政体:“此等皆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史纲评要》卷四)他所力倡的中央直接管理郡县的行政格局,按照王夫之的说法:“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读通鉴论》卷一)

李斯走向成功的人生道路,起步时竟然有与“鼠”相关的故事。《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开篇就记载了他早年的励志故事:“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里说“为郡小吏”,按照司马贞《索隐》的解释,只是“乡小吏”,引“刘氏云‘掌乡文书’”。李斯少年时,身份为底层小吏,看到住处的“厕中鼠”,食用的是不清洁的物品,活动地点离人和狗都比较近,经常因此惊恐。李斯进入粮仓,又看到“仓中鼠”,吃的是数

量充备的“积粟”,居住空间宽敞高大,又不会面对频繁受到人和狗侵扰之忧。李斯想,同样都是“鼠”,却有这样鲜明的差别。于是感叹道:人的境遇高显或者卑下,人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就像“鼠”一样,全在自己选择位置。

李斯于是追随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于楚国,但是判断“楚王不足事”,又看到“六国皆弱”,发现“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决心“西入秦”。后来成为有作为的政治家。《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的《索隐述赞》写道:“鼠在所居,人固择地。”也突出强调了李斯“观仓中鼠”故事的意义,用以启示《史记》的读者。

顾炎武诗作《有叹》涉及李斯言行:“少小事荀卿,佔毕更寒暑。慨然青云志,一旦从羁旅。西游到咸阳,上书寤英主。复有金石辞,粲烂垂千古。如何壮士怀,但慕仓中鼠。……”(《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卷一四)李斯“慨然”“粲烂”的“壮士怀”,竟然因“慕仓中鼠”得以激发,确实是古来人才史、人才思想史、个人奋斗史中的非常有意思的情节。《史记》保留了这样难得的心理记录,是我们应当感谢司马迁的。

#### 五、张汤 “劾鼠”

汉武帝时代著名酷吏张汤,对于当时法律建设和司法风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有这样的评价:“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司马迁记述了张汤未成年时因“鼠盗肉”而设廷讯审问“鼠”的故事:“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

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少年张汤“守舍”疏失，因“鼠盗肉”受到父亲责打，于是掘开鼠洞，捕得“盗鼠”，严刑审讯，其“劾鼠”形式，“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直至处刑，“具狱磔堂下”，程式一如正规法庭，“其文辞如老狱吏”。其父因此“大惊”，于是后来安排他参与司法的学习和实践。

关于张汤捕得“盗鼠”的方式，《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说“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艺文类聚》卷九五引《史记》作“汤掘，遂得盗鼠及余肉”。《汉书》卷五九《张汤传》说：“汤掘熏得鼠及余肉。”采用了“熏”的方式，与《史记》不同。《太平御览》卷五一八引《汉书》作“汤掘地熏鼠得余肉”，卷六四三引《汉书》作“汤掘熏得鼠及余肉”。也都说到“熏”。卷八六三引《汉书》作“汤掘室得鼠及余肉”。

“劾鼠”故事，对于张汤来说，影响了他的人生方向；对于汉帝国来说，实现了一位司法大臣事业的启程；对中国法律史来说，则标志着一位法学人才成功的起跑线。

张汤“为儿”时“劾鼠”的事迹，后来成为历代诗文习用之典。如唐人骆宾王“折狱磔鼠，谢其严明”文句(《上齐州张司马启》，《骆临海集》卷七)，宋人李彭“劾鼠得备具，妙处固难忘”(《游仙二首》之一《日涉园集》卷三)诗句。金人李俊民诗“书爱换鹅功不到，狱因劾鼠法先知”(《又用济之韵赠子昂》，《庄靖集》卷二)，也说张汤“劾鼠”事。宋人李流谦诗“对客颇能嗔字父，劾鼠狱词老吏服”(《观小儿瓮戏》，《澹斋集》卷三)，则以儿童生

活考察的视角回顾“劾鼠”故事。

宋人刘克庄曾撰《劾鼠赋》，文辞生动，值得一读。他就鼠啮造成珍爱图书的损坏，写述了伤心和愤恨：“余悯黄卷兮惧白蟫之害，颇整比其散乱兮又补完其破碎。手自肩鐫兮若巾袭于珍具，虽稍辟以蠹类兮曾不虞于鼠辈。”警惕书蠹的危害，却疏忽了鼠患，“偶一夕之慵夕遗数帙其外，明发起视兮遭毒喙。皮壳无恙兮残腹背，余意不怡兮朝食废。”书籍残破，心情不好，以致不思饮食。于是想到张汤“劾鼠”古事：“思古事兮发深慨，彼盗肉兮汝常态，尚熏掘而诛磔兮矧灭籍之罪大。余非刀笔吏兮莫鞫讯而捕逮，始诘汝以理兮具以臆对。”

他说，我家“余廪有粟兮菽园有果菜”，且“库有醯醪兮庖有脯醢”，责问鼠辈“汝出没其间兮且攫且嘬”，通常“每择取其甘鲜”，而只留给我残败。刘克庄又愤然斥问：“汝于此兮夫岂不快，书于汝兮曾微纤芥。”如此还不满足，竟然损坏对你并没有什么诱惑力的图书！难道你“前身”是从事“剽窃”的“盗儒”吗？他表示自己“嗜书”超过饮食美味，“虽无万卷兮寸纸亦爱”。遂严词警告鼠辈：“犯前数条兮原其罪，惟啮余书兮不汝贷。求良猫兮设毒械，如永某氏之鸟兮汝毋悔。”最终，“鼠默然失辞兮叩头而退。”(《后村集》卷四九)

(本文节选自王子今《上林繁叶：秦汉生态史丛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秦汉史专家。)

# 明清人迹路程图中的文天祥记忆

吴 寒

**摘要:**“人迹路程图”是一类在地理信息之外辅以大量历史文化注记的舆图。主要是出于价值取向、历史背景、地理观念三方面原因,此类舆图中表现出对文天祥史迹的重视。首先,“人迹路程图”独特的价值取向使得文天祥的忠节形象受到尊崇。其次,明中末期的政治背景促使绘制者突出文天祥及其它南宋史迹以激励人心。再次,“人迹路程图”所秉承的文化空间观念,也使得文天祥写作《过零丁洋》这一事迹成为全图海疆叙事的重要一环。舆图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客观反映,更从价值关怀、政治意识、文化观念等多个维度,形成了“历史—地理—价值—文化”的关联图式,在文天祥形象的传承和建构方面起到了独特作用。

**关键词:**人迹路程图;文天祥;古地图

文天祥(1236—1283)是南宋末年抗元名臣,他被俘后坚定不屈,于珠江口外一带海域写下《过零丁洋》以明志,其忠勇气节一直为后世所景仰。文天祥身后,他的诗文集被编撰再版,纪念活动也长期进行,文天祥逐渐成为一个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

关于文天祥历史形象的传承与建构,以往学界多有关注,并就关于文天祥的刻碑立传、祠堂修建、史料记载、别集刊刻等展开了相关研究<sup>[1]</sup>。不过,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文字记载,而对于明清时期的舆图资料关注不多。事实上,中国古代有一类被称为“人迹路程图”的特殊地图,它们往往选择“古今人物之美,或政事之有益于生民,或节义之有裨于风化,或理学之有补于六经者”<sup>[2]</sup>,将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平活动与相应地理空间相结合,形成一类独特的融历史记忆于空间展示的舆图类型。此类舆图对文天祥表现出了格外的关注,尤其是文天祥写作《过零丁洋》一诗的活动,

成为这些舆图描绘的重点之一。由宏观视角观之,文天祥记忆甚至成为此类地图表现海疆叙事的重要一环。

可以说,舆图资料对于文天祥记忆的建构和强化,起到了积极的媒介作用,其将文天祥的生平事迹与相应地理空间联系起来,也使得文天祥的忠节形象在具体场景中显得更加丰满和聚焦,这一图像作用机制值得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以明清古地图中的文天祥记忆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表现重点、绘制背景等,进而探讨地图在文天祥形象传播中所起到的作用。此外,也可由文天祥这一个例出发,分析“人迹路程图”这一地图类别的绘制和嬗变背后蕴含的文化心理。

## 一、明清人迹路程图中的文天祥

石冰洁《从现存宋至清“总图”图名看古人“由虚到实”的疆域地理认知》一文将传统“王朝疆域图”总结为五类,分别为“一统图”“广舆图”“人迹路程图”“皇舆全览图”“大清万年一统系

图”<sup>[3]</sup>。其中的“人迹路程图”一类，在地理信息之外，还加入了大量区域建置沿革、风俗、人物、物产的记载，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幅“人迹路程图”为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之《古今形胜之图》，此图中就出现了三处关于文天祥的记载，一处为广东香山零丁洋海域，标注“香山县，文天祥过零丁洋此”；一处为福

建延平，标注“文丞相开督府南剑州”；一处为广东惠州，标注“元执文天祥于五坡岭此”。而之后的此类舆图虽然在表现范围、绘制手法、详略程度、信息侧重等方面有所不同，但都延续了对于文天祥生平活动的记叙。统计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明清古地图，涉及文天祥史事的共有12种，其中10幅为单幅地图，两幅为书籍中的插图<sup>[4]</sup>。

表1 明清人迹路程图中出现的文天祥史迹

圖名	時間	作者	尺寸	史迹標注	藏地
古今形勝之圖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喻時	115×100厘米	香山县，文天祥过零丁洋此。 文丞相开督府南剑州。 元执文天祥于五坡岭此。	西班牙西維爾亞西印度群島檔案館
古今天下形勝之圖	約明萬曆五年（1577） <sup>⑤</sup>	章潢	不詳	香山县，文天祥过零丁洋。 文天祥开督府南劍州。 元執文天祥于此。	《圖書編》卷三十四，明萬曆四十年（1613）刻本，國家圖書館
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迹	明萬曆二十年（1593）	梁輶	172.5×132.5厘米	文天祥過零丁洋此。 文天祥開督府南劍州。 元執文天祥于五坡嶺此。	英國菲利普·羅賓遜圖書館
皇明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迹	明崇禎十六年（1643）	季明臺	147.5×166.3厘米	香山，屬廣州府，文天祥過零丁洋即此。	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
九州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迹	明崇禎十六年（1643）	季明臺	142.5×121.5厘米	香山，屬廣州府，文天祥過零丁洋即此。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圖書館
天下九邊分野人迹路程全圖	明崇禎十七年（1644）	曹君義	125×124厘米	香山，屬廣州府，文天祥過零丁洋即此。	國家圖書館
華夷古今形勝圖	南明福王弘光元年（1645）	朱紹本等	每册23×29厘米	香山县，文天祥过零丁洋。 文天祥开督府南劍州。 元执文天祥于五坡岭。	《地圖綜要》總卷，明弘光元年（1645）刻本，國家圖書館
大明九邊萬國人迹路程全圖	清康熙二年（1662）	王君甫	約120×120厘米	香山，屬廣州府，文天祥過零丁洋即此。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等
南瞻部洲萬國掌果之圖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	浪華子	115×143厘米	香山，文天祥址。	美國斯坦福大學大衛·拉姆齊地圖圖書館
乾隆天下輿地圖	清乾隆八年（1743）後	不詳	132×170厘米	文天祥過零丁洋此。 元執文天祥于五坡嶺此。	大英圖書館
大清廣輿圖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5）	久保亨	不詳	元執文天祥此。 文天祥開督府。 垂珠嶺，文天祥登山流泪，故名。 宋文天祥舟師出此。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古今地輿全圖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	劉明杰	101×175厘米	零丁洋，文天祥零丁洋詩即此。	馬可孛羅地圖館

总的来说,明清古地图资料中涉及的文天祥史事主要有 5 宗,以下按时间顺序列举:

一是南宋景炎元年(1276)秋七月,文天祥于福建延平南剑州开都督府,聚兵抗元。《宋史纪事本末》载:“秋七月,文天祥开府南剑州,经略江西。”<sup>[6]</sup>此事在各幅地图中共出现 6 次。

二是南宋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在福建漳州路过一处山岭,回顾落泪,因此这座山被命名为“垂珠岭”。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宋景炎二年,元兵破汀关,丞相文天祥移兵屯漳州,过此岭,回顾垂涕,居民哀之,表以此名。”<sup>[7]</sup>这一标注只在《大清广舆图》中出现了 1 次。

三是文天祥于南宋景炎三年(1278)三月屯兵丽江浦。《宋史纪事本末》载:“三月……文天祥

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趋之行,收兵出海丰县,遂次于丽江浦。”<sup>[8]</sup>这一标注也只出现了 1 次,即日本绘《大清广舆图》在惠州捷胜丽江一带注文:“宋文天祥舟师出此。”

四是南宋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张弘范攻潮阳,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宋史纪事本末》载:“天祥方饭五坡岭,弘正兵突至,众不及战,天祥遂被执。”<sup>[9]</sup>此事在各幅地图中共出现 6 次。

五是文天祥写作《过零丁洋》,此诗约写作于南宋祥兴三年(1279),文天祥被俘之后路过零丁洋时。《宋史纪事本末》载:“弘范乃命文天祥为书招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



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sup>[10]</sup>此事在舆图中共出现了 11 次。

总的来说，这些舆图资料对文天祥事迹的记载，基本涵盖了文天祥抗元时期的重要活动，在空间上也囊括了他在广东、福建一带较为重要的活动地点。

## 二、人迹路程图表现文天祥史迹的特点

结合具体的图绘，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明清古地图对文天祥史迹表现的几个特点：

第一，相较其他人物来说，明清古地图中涉及文天祥的空间标注较多。最早的《古今形胜之图》中就出现了“零丁洋”“五坡岭”“南剑州”3 处，此后《古今天下形胜之图》《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等舆图中都出现了这几处标注，日本年绘《大清广舆图》中又增加“丽江”“垂珠岭”两处，总计 5 处。尽管这些“人迹路程图”大多图幅较大、文字注解也比较丰富，但毕竟古往今来人物众多，地图中要表现的各类信息也很多，大部分人物都只是一笔带过。以《地图综要》中的《华夷古今形胜图》为例，这张图是书籍中的插图，图版较小，因此对文字信息进行了大幅删减，多数人物都只出现了一次，而文天祥则标注了 3 处。足见其对文天祥的重视。而另一幅王君甫刊刻《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虽与《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等属同一图系，但更重视对各行政区域的表现，而省去了大量风俗、建制、人物信息，文字相较其它舆图来说大为简略，却仍然在珠江口专门标绘“香山，属广州府，文天祥过零丁洋即此”。纵观其它各幅“人迹路程图”，尽管各图文字标注有详有略，却基本上都保留了对文天祥史迹的描绘。“人迹路程图”对文天祥的重视可见一斑。

第二，涉及文天祥的舆图，时间、地域跨度较大。从明嘉靖年间所刻《古今形胜之图》，到清光绪年间刊刻的《古今地舆全图》，时间跨度三百多年，目前统计所能见到的“人迹路程图”全都没有遗漏文天祥的信息。而这批舆图中，更有不少是在日本绘制的，这说明，在“人迹路程图”这一舆图绘制类型传到日本之后，这些摹绘之作同样保留了文天祥相关事迹的记载。可见，在“人迹路程图”这一舆图类型的传承和发展中，文天祥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要素，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或是地域的变化而被绘制者删去。

第三，明清舆图对文天祥事迹的表现，尤为重要的就是他写作《过零丁洋》一事。《过零丁洋》是文天祥一生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名篇之一，而此篇以“零丁洋”命篇，诗中更有“零丁洋里叹零丁”一句，将伶仃洋这一地名与文天祥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文天祥人生中的重要地理坐标。本文统计的 12 种舆图，有 11 种都在珠江口海域专门以方框或圆框标注此事，而日本地图《南瞻部洲万国掌果之图》在珠江口海域的小岛标注“香山，文天祥址”，直接将文天祥与香山这一地名联系在了一起。而文天祥在香山一带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写作《过零丁洋》。《澳门记略·形势篇》记载：“澳东为东澳山……又东为零丁山，东莞、香山、新安三邑画界处，下为零丁洋。”<sup>[11]</sup>

第四，舆图中的文天祥史迹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和一系列南宋末年史迹形成呼应。《古今形胜之图》中，就在三处文天祥史迹之余，在东南沿海一带标注了大量南宋末年的其它文化事件，例如在福州标识“宋端宗避元即位此”，在崖山一带标注“陆秀夫抱帝死崖山此”等，这些事件共同形成了对南宋末年历史事件的空间标识，也大致串

起了南宋末期宋端宗即位、流亡政权建立、宋末三杰抗元，一直到陆秀夫带幼帝赵昺自尽的历史进程。这样，读者在阅览这幅地图的东南沿海部分时，就跟随地图不断形成了对那一时期历史事件的强化记忆。这种现象一直贯穿了“人迹路程图”的发展历程，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刘明杰《古今地舆全图》中仍有所发展，此图在东南沿海标注了“陆秀夫墓”“张世杰墓”“海陵山，张世杰自厓山突围而出，至山下，风作，溺死”“硇州，宋端宗崩此”等南宋史迹。

第五，“人迹路程图”传到日本之后，相关舆图中对文天祥的表现继续丰富。以日绘《大清广舆图》为例，根据图上介绍，此图本于蔡九霞《广舆记》：“唐土大图行于世者，无有善本，今据蔡九霞《广舆记》图本扩之，以诸书增订之。”《广舆记》一书为明万历陆应阳辑，蔡九霞增订刊刻于清康熙年间，蔡氏增订本中有大清一统全图和各省分图，而这些舆图仅表现地名信息和行政建制，并无地理信息之外的文化类介绍，这说明，《大清广舆图》的制作者在《广舆记》中基本行政疆域图的基础上，融合其它文献的记载，增订了大量的文字注记和文化信息。前文已经提到，此图中出现了两处在本土“人迹路程图”中未见的标注，一处是捷胜一带“宋文天祥舟师出此”，另一处是漳州垂珠岭“垂珠岭，文天祥登山流泪，故名”，这帮助日本绘“人迹路程图”中对文天祥史迹的记载仍有发展。此外，涉及文天祥史事的日本绘舆图，一定程度上已经溢出了“人迹路程图”的范围。传统的“人迹路程图”表现的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地理观念。而日绘《南瞻部洲万国掌果之图》是一幅表现佛教世界观的地图。这幅图描绘了佛教传说中四大部洲之一——南瞻部洲

的地理情况，以印度、中国、日本为表现的主体，其中的文化信息标注不多。其中的中国部分，除了一些红笔和白笔标注之外，原图上几乎没有出现地名之外的文化信息，却在珠江口标注了一处“香山，文天祥址”。这一现象非常独特，这帮助这幅图的绘制者很可能参考了一幅“人迹路程图”，并将文天祥这一历史信息吸纳到了这幅佛教舆图之中。这种种情况从侧面反映了文天祥形象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

### 三、文天祥与“人迹路程图”

文天祥为什么在“人迹路程图”中受到格外重视？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由此也可管窥“人迹路程图”这一独特的舆图类型，其图式的形成和嬗变背后蕴含的文化心理。

#### （一）“人迹路程图”的价值取向

“人迹路程图”是一种独特的舆图类型，它从一开始就兼具地理和历史教育的功能。《古今形胜之图》右下角有一段文字介绍其编纂缘起：“依统志集此图，欲便于学者览史，易知天下形胜、古今要害之地。其有治邑，原无典故者，不克尽列。”<sup>[12]</sup>从这段文字来看，《古今形胜之图》的编纂，意义就在于便于学者览史，因此，除了标准化的地理信息之外，图中还辅以大量文字注记，介绍山川胜美或地势险要之地，以及各地的历史典故。而到了《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则更强调历史人物的教育功能，图记专门解释了“人物事迹”的选择标准：“古今人物之美，或政事之有益于生民，或节义之有裨于风化，或理学之有补于六经者，则注于某州某县之侧。”<sup>[13]</sup>《乾隆天下舆地图》称此图“所注古今建置沿革、名贤古迹、府州形胜、向时风俗，俱系摘录《广舆》诸书，甚有关于学问格致修齐治平之助”<sup>[14]</sup>。由此看来，“人迹路程

图”一类舆图，有着非常强的传统价值取向，制作者希望通过对典范人物的彰显，让阅读者对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有所了解，达到历史教育的目的。

综观“人迹路程图”对于人物事迹的选择，可以看到两个主要的取向，一是“因人”，也就是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在此地出生或活动，人物为此地增加了文化底蕴；二是“因事”，也就是一些关键性的历史事件或战争发生于此，能帮助此地的独特地理形势和险要地位。而文天祥是符合这两大选择标准的。首先，文天祥作为南宋抗元名臣，其忠勇气节为后人所赞颂，有非常强的道德典范意义。同时，文天祥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活动，尤其是其写作《过零丁洋》的事迹，也标识了宋末元初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由于《过零丁洋》一诗的流行，伶仃洋这一意象与文天祥的忠节形象联系在一起。有清一代，伶仃洋海域作为珠江口战略要地，联通了周围的香山、新安等县，这一区域既有葡萄牙人盘踞，又有倭寇和海盗袭扰，成为广东中路海防的防御重点<sup>[15]</sup>。后人抚今追昔，也往往将伶仃洋与外夷入侵、山河破碎联系起来，如汪兆镛《楼头看月口占二首》：“药里绳床梦乍醒，望洋何忍说伶仃。谁教大好清江月，复照珠江万古腥。”<sup>[16]</sup>金曾澄《港战有怀，时客濠江》：“寸心莫慰飘零梦，粒食难疗饥馑民。惆怅伶仃洋外望，倚栏应有断肠人。”<sup>[17]</sup>梁简能《壬午初春偕赵少昂偷渡澳门，舟次伶仃洋，感怀有作》：“伶仃洋上水声悲，似向穹苍诉乱离……鲁阳戈在应挥手，文相诗遥已欢时。”<sup>[18]</sup>因此，“人迹路程图”对于文天祥事迹的标识，可谓兼有历史地理教育和彰显道德典范的意义。

## (二)“人迹路程图”的历史背景

“人迹路程图”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

回顾目前所见的“人迹路程图”，最早的《古今形胜之图》为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此时已值明代中期，内忧外患逐渐显露，北有蒙古侵袭，东南沿海有倭寇滋扰。而此图强调文天祥事迹的同时，以大量笔墨介绍了其它南宋末年的抗元史迹。这一系列南宋史迹的标识并非偶然现象，它帮助作者是有意识地强调这一时期的历史记忆的。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作者在国家忧患之时，希望以这些勇抗外侮的英雄事迹，强化民族意识，激励民众的抗争情绪。因此，在这些舆图中，地理信息和历史记忆相结合，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结人心的作用。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此图作者喻时为江西人，他在舆图中强调江西籍的文天祥，也可能与自己的籍贯有一定关系<sup>[19]</sup>。

“人迹路程图”产生最多的时段是明晚期万历、崇祯年间，其时正值明末风雨飘摇之际，这些地图中的南宋史迹也更加丰富。除了文天祥之外，相关舆图对同为抗元将领的陆秀夫等人也更为关注。例如陆秀夫的介绍在《古今形胜之图》中只有简短的“陆秀夫抱帝死崖山此”，而绘制于明万历二十年(1593)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一图，将陆秀夫事迹扩充为“崖山在新会南八十里海中，宋末帝昺驻跸于此，元追，迫陆秀夫朝服抱帝赴海死”。到崇祯年间的《皇明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和《九州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又进一步扩充为“崖山在新会南八十里海中，宋帝昺驻跸于此，元将张弘范迫急，丞相陆秀夫朝服抱帝赴海死，秀夫，淮南盐城县人”。增加了对陆秀夫籍贯的记述。结合晚明时期的特殊形势，舆图绘制者很可能是希望通过宋末史事的描绘，激发斗争情绪，实现历史教育和凝聚民族精神的作用，从而为现实政治服务。

学者已经指出,明末是文天祥文化记忆形成和传播的关键时期之一,这是由当时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影响而造成的<sup>[20]</sup>。结合相关舆图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地图中对文天祥记忆的展示,同样符合了这一历史趋势,明末舆图对于文天祥及其它南宋史迹的强调,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建构集体记忆的一种方式,展现了绘制者的政治关怀。而随着诸种地图对南宋末年历史遗迹的不断强化,岭南一带的历史文化记忆与相应的地理空间之间,也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 (三)“人迹路程图”的地理观念与边疆叙事

“人迹路程图”的描绘重点,是以华夏地域为中心的传统世界观念。从明中叶的《古今形胜之图》开始,全图的主要篇幅便是以明代的两京十三省为中心,拓展到周边的陆疆和海疆,并进一步延伸到周边的朝鲜、日本、爪哇、缅甸等地。这一基本的“由内而外”、由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逐渐向外蔓延拓展的传统地理观念,在《古今形胜之图》中就已经基本定型,而舆图对华夏大地上古今人物之美的弘扬,对各地物产、名胜、重要历史事件的介绍,也正意在凸显华夏文明居于世界中心的自我认识,在表现地理信息的同时不断强化其人文意涵。换句话说,在丰富文化信息的加持下,“人迹路程图”所展现的,不仅仅是作为空间地理的“中心”,更是文化上的“中心”。正如《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所说:“内而中华山河之胜,古今人物之美……外而穷荒绝域,北至北极,南越海表,东至汪洋,西极流沙。”

在这种“区分内外”的传统文化观念之下,对边疆的描绘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理维度。“人迹路程图”和其他中国古代的其他世界地图一样,有意识地划定了华夏文明区域。具体而言,西北陆

疆以北部的长城和西部的黄河为主要标志,其重要意象有长城关隘、边城重镇、星宿海等。而东南海疆则沿海标识了一些水路、海域、海岛等作为地域标识,形成一系列海疆意象。

而在地理表现之余,“人迹路程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历史文化信息的标识。在华夏文明区域,舆图中密密麻麻地罗列了地名、建制,因此相关文化信息只能见缝插针,内容往往寥寥数字非常简短。但是在边疆区域有大量空白区域,因此,绘制者沿着边疆区域标识了一系列典故、传说、重要事件和人物,较内陆区域要详细得多,这些信息以方框或圆框重点标识,于边疆沿线环绕华夏文明区域,这从客观上强化了文化上的边界,形成了独特的边疆叙事。

从这个维度出发考察“人迹路程图”对文天祥史迹的记录,可以发现,本文所统计的 12 种舆图中,唯一没有标注这一事件的是日本人所绘的《大清广舆图》,这很可能与日本人没有那么强的华夏边疆意识有关。随着时代的发展,零丁洋周边增加了“澳门”“香港”和其他岛屿名称等更详细的地域标识,甚至多以方框或圆框重点标注,使得文天祥写作《过零丁洋》这一文化事件成为一个重要的沿海文化意象,作为海疆叙事的一环,与其它沿海典故,如“秦筑长城,入泥数里,以舟载生铁沉于海中为根底”,“成化以前运粮由此路,三五日至成山甚便,然坏船甚多,合不敢行”等沿海故实一起,在“人迹路程图”中承担了海疆叙事的文化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天祥史迹于“人迹路程图”的意义,也就超越了一般的道德典范人物,而有了文化空间标识的作用。因此,《过零丁洋》的写作,也成为“人迹路程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要素。

## 四、小结

“人迹路程图”对文天祥的重视,形成了一种对文天祥形象的传承建构方式,是相关文化记忆的独特载体。不同时期的舆图将文天祥生平事迹标注于相应的地理空间,形成了一种“历史-地理-文化-价值”的关联图式,促使观看者不断强化这些空间坐标,形成关于文天祥的更加丰满和立体的形象记忆。

### 注释:

- [1] 针对文天祥形象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文亮:《明末绝命词中的文天祥形象》,《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郭辉,李百胜:《历史记忆与社会动员:抗战动员中的“文天祥”记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杨年丰:《明清时期文天祥形象的记忆与认同》,《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陈功林:《文天祥形象的塑造与演变》,江西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顾宝林,欧阳明亮:《明代对历史人物风范的记忆与建构——以文天祥为例》,《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出发,聚焦相应时段,对文天祥形象的传播和发展进行了分析。
- [2]《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国家图书馆藏,藏号:1/1593。
- [3]石冰洁:《从现存宋至清“总图”图名看古人“由虚到实”的疆域地理认知》,《历史地理》2016年第1期。
- [4]文中提到的“人迹路程图”主要来源于各大图书馆网站、数据库、拍卖图录等,并参考了成一农《“古今形胜之图”系列地图研究》(《形象史学》第十五辑)、石冰洁《从现存宋至清“总图”图名看古人“由虚到实”的疆域地理认知》(《历史地理》2016年第1期)等文所作的统计,基本上囊括了目前能检索到图像的“人迹路程图”。由于此类地图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流传,因此本文的检索难以穷尽,不过这些舆图应该可以代表这一系

列舆图的整体情况。

- [5]据万尚烈《刻章聘君先生图书编丐叙》,章潢编辑《图书编》“肇于嘉靖壬戌,成于万历丁丑”。据考证成稿之后章氏还在持续修订,但无论如何,此书完稿应不晚于章氏卒年,即万历三十六年(1608)。
- [6]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1170页。
- [7]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4494页。
- [8]同注⑥,1177页。
- [9]同注⑥,1180页。
- [10]同注⑥,1181页。
- [11](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清乾隆十六年刻本,6页。
- [12]国家图书馆藏,藏号:2/1555-2。
- [13]国家图书馆藏,藏号:1/1593。
- [14]参见 <http://www.guoxuei.com/gjzx/435752plij/47685/> [2021.4.6]
- [15]参考鲁延召:《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海防地理特征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9期。
- [16]章文钦笺注:《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珠海出版社、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01年,121页。
- [17]同注16,584页。
- [18]转引自郑炜明:《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述论(下)》,《许昌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 [19]徐晓望:《林希元、喻时及金沙书院〈古今形胜之图〉的刊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 [20]顾宝林、欧阳明亮:《明代对历史人物风范的记忆与建构——以文天祥为例》,《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  
(本文原发表于《文津学志》第十六辑。吴寒: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

## 西北大学黄帝文化研究院

2021年12月8日正式挂牌成立的黄帝文化研究院，是由黄帝陵基金会和西北大学联合组建的实体研究机构。旨在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标识，推动黄帝文化研究持久深入地发展。目的是形成政府、社会组织、高校的密切合作，发挥多方优势，创新机制体制、形成高效灵活的运行模式，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发展多方支持合作共赢的局面。其基本架构为，黄帝文化研究院挂靠西北大学，由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协助组建，研究院首届领导由黄帝陵基金会理事长白阿莹担任名誉院长，长江学者、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教授担任院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阳举教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马健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杭担任副院长。

学院首届学术委员会由著名学者张岂之先生担任主任，聘任刘跃进、王震中、葛承雍、詹福瑞、常绍民、孙少华、周绚隆、林安梧、李宗桂、王子今、周群、肖永明、孙周勇、赵世超、林乐昌、刘学智等内地及香港、台湾高校研究机构的20位知名学者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聘任王晖、周淑萍、何炳武、高强、陈平社、穆涛、高亚平、谷鹏飞、李军、胡宗峰、王春泉、钱耀鹏、张茂泽、高兵兵、岳宏志、郑熊、李友广、陈战锋等校内外18名专家担任首批特聘研究员。

西北大学开展黄帝文化领域的研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全国黄帝文化研究的重镇。成立

于1991年在全国黄帝文化研究领域有着重要影响的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就挂靠西北大学，它是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性社会团体，研究会以会长张岂之先生、副会长刘宝才先生为代表聚集了一批黄帝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完成了陕西省志《黄帝陵志》、参与《黄帝文典》等大型志书典籍类文库的编纂，以及《黄帝祭文集》等史料文献的整理研究，并创办了《华夏文化》期刊，成为刊发黄帝文化研究最新成果的全国性平台。

除专门研究外，西北大学始终积极参与黄帝陵祭祀的社会性公益活动，不仅多次承担陕西省公祭黄帝陵祭文撰写工作，并且自2003年至今一直承担黄帝陵公祭活动中黄帝文化学术论坛项目的策划、组织工作，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14届学术论坛，在海内外学术界以及华人领域影响巨大，已成为具有学术号召力的品牌活动。

成立于2016年底的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更是学校聚合各方资源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平台，以长江学者李浩为学术带头人，凝聚力量，引进人才，形成团队，凝炼出多个研究方向，其中黄帝文化研究亦为重要方向，专门引进黄帝文化研究方面的青年博土学者，并且积极为地方重大文化建设服务，2019年与黄帝陵园区管委会合作，承担《黄帝祭文汇编简注》的编撰工作，于2021年清明公祭黄帝陵活动中成功举办新书发布会，该书不仅成为参加黄帝文化



论坛全国学者争相留存的学术文献,也成为参与公祭活动重要嘉宾的珍贵礼物,极大地宣传了黄帝与黄帝文化,也进一步提升了黄帝陵祭祀的影响力。

新成立的黄帝文化研究院,未来将主要开展以下工作:拓展和深化有关黄帝文化的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田野调查等领域的研究阐释工作;联合相关政府部门与专门科研机构,围绕黄帝文化设立专项课题,搭建科研平台;组织策划黄帝文化学术交流,开展黄帝文化教育普及工作;负责研究编撰黄帝文化相关书籍资料,编撰

出版相关学术论文集,推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将与黄帝陵基金会全面合作,每年投入专项经费用于设立黄帝文化研究课题、黄帝文化奖评选、黄帝文化国际研讨会暨颁奖典礼等项目。

西北大学黄帝文化研究院将在多方资源的支持下,充分把握国家大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战略机遇,致力于对黄帝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的挖掘与阐释,打造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黄帝文化研究、传播高端平台,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 历史学家——王子今



王子今，1950年12月生于哈尔滨。1982年1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84年12月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历史组成员、第七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成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访问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鸿国讲座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兼职：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秦汉考古文物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出版学术著作《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权力的黑光：中国传统政治迷信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门祭与门神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史记的文化发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千秋太史公》(书海出版社馆2018年)，《中国女子从军史》(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年)，《中国文化节奏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忠”观念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中国盗墓史》(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2000年，九州出版社2007年)，《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0年增订本)，《钱神》(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秦汉社会史论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秦汉史：帝国的成立》(三民书局2009年，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汉代儿童生活》(三秦出版社2012年)，《秦汉社会意识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秦汉称谓研究》(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王子今学术经典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秦汉交通史新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东方海王:秦汉时期齐人的海洋开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中国蜀道·历史沿革》(三秦出版社 2015 年),《秦汉交通考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战国秦汉交通格局与区域行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中国古代交通文化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秦汉名物丛考》(东方出版社 2016 年),《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7 年),《长沙简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秦汉儿童的世界》(中华书局 2018 年),《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8 年),《秦汉盐史论稿》(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年),《插图秦汉儿童史》(未来出版社 2020 年),《芝车龙马:秦汉交通文化考察》(西北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秦交通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秦史人物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年),《秦汉海洋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等 50 余部。

发表学术论文 840 余篇。发表其他学术文章 410 余篇。

曾经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交通史研究”“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社会称谓研究”“匈奴经营西域研究”

“秦汉时期的海洋探索与早期海洋学研究”,教育部课题“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生活研究”,均顺利结项,最终成果出版。其中《秦汉称谓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及“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秦汉海洋文化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秦汉儿童的世界》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以“优秀”等级结项。

正在进行的项目: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兰台学术计划”)“中华文明起源与历史文化研究专题”委托项目“中华文化基因的渊源与演进”。

曾获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北京市第 8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第 13 届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第 15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第 16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论文奖二等奖,第一届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奖二等奖,“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之“国学优秀成果奖”“致敬国学——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奖”之“国学优秀成果奖”“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

## 文学专家——蒋寅



蒋寅教授，文学博士。男，1959年出生，江苏南京人。1982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现扬州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于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部获文学硕士学位。1988年于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3月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96年晋升为研究员。曾任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2016年7月起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 人物简介

1978—1982年就读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1985年就读于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部，师从胡光舟诸先生，攻读中国文学史专业硕士学位，1985—1988年就读于南京大学研究

生院，师从程千帆、周勋初先生，攻读唐宋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曾两度获中文系研究生“黄侃学术奖”及研究生院“新星奖”。同年3月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6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2004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定聘为二级研究员。2012年1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长城学者”资助。兼任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东方诗话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文学评论》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受聘为日本京都大学、韩国庆北大学、台湾逢甲大学、东华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者”特聘教授，华侨大学、安徽大学特聘教授。先后获各种学术奖20余次。

### 学术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中唐诗为中心，研究唐代大历诗歌和诗人。90年代以后主要研究中国古典诗学、诗学史，重心放在清代诗学史和传统诗学基本概念与命题的研究上，同时进行清代诗学著作的辑考工作。承担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历诗派与诗人”（198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础课题“乾隆朝诗学的历史展开研究”（2012），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古代文学通论”（2003，与傅璇琮共同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代文人事迹编年汇考”（2015）、中国社会科

院重大课题“中国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2002,与刘扬忠共同主持)及多项院、所级个人项目,主持国家清史工程《文苑传》编纂并担任《文学艺术志》审改定稿专家。创办并主编《中国诗学》论丛。曾与傅璇琮先生共同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与刘扬忠先生共同主编《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出版学术专著《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中华书局,2003)、《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清代文学论稿》(凤凰出版社,2009)、《金陵生文学史论集》(辽海出版社,2009)、《清代诗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百代之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镜与灯——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整理古籍《戴叔伦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权德舆诗文集编年笺注》(辽海出版社,2013,合作)《原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全浙诗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合作),译著《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东方美学》(三联书店,1991,合译)、《终南山的变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合译)、《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凤凰出版社,2008)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50 余篇、译文 30 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50 余次。

### 人物评价

在唐代诗歌研究方面,《大历诗风》作为国内第一部综合性研究一个诗史时段的著作,将历来不被人重视的大历诗歌与开元、元和诗相比较,揭示其独特价值及诗史意义。全书以诗人的感受方式、表现方式为核心,从心态史、时空观念、意象结构等不同视角进行透视,以一种新的诗史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赢得学术界的好评。在清代诗学研究方面,已出版的《王渔洋事迹征略》和《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以搜集资料之广泛、研究角度之新颖与讨论问题之深入,为同行所首肯。对清诗话的访求、编目和叙录,为清代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多年访求、考索基础上编纂的《清诗话考》一书,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对古典诗学基本概念和命题的研究,给学术界带来启发,引起不少讨论和后续研究,有较高的征引率。

学术特点是阅读广泛,勤于思考,由文献学入手,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同时立足于文学研究,广泛涉猎中外文史哲理论,力求多角度地思考文学问题。研究古代文学理论,注重将问题还原到历史过程中去认识;进行作家批评,注重站在文体学的立场,从文体自身的发展来看作家才能的运用。无论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都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同时对学科建设抱有热情,关注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所著学术史研究和学术批评文集《学术的年轮》,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不少文章在网络上被反复转载。

## 新书推介

### ◆《丝路·长安国际译丛》

西安是公认的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的起点，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在世界史上也是最重要最著名的文明古都。长期以来，国内外对古代长安和长安文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蔚为大观，但域外对长安和长安文化的研究成果的引入，目前在国内还基本上处于空白。而研究长安的国际影响，一方面需要了解长安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及本土化过程，另一方面需要了解国外学界是如何研究长安的。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让国内的广大读者了解国外学者研究长安文化的优秀成果，了解域外学者从他们的视角怎么看待长安文化，我们策划了《丝路·长安国际译丛》选题，主要筛选一批海外各国学者的优秀著作，组织一批翻译界的专家学者进行翻译。《丝路·长安国际译丛》第一辑，主要为东亚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长安史迹研究》([日]足立喜六著)《长安的都市规划》([日]妹尾达彦著)《唐代长安镇墓石研究》([日]加地有定著)《长安》([日]佐藤武敏著)《长安之春》([日]石田幹之助著)《秦陇纪行》([日] 加地哲定著)《长安——绚烂的唐都》(日本京都文化博物馆编)。本辑由陕西师范大学王双怀教授、西北大学高兵兵教授担任主编，并由他们与翁建文、徐璐、张鹏等日语系教授分别担任译笔，译成后将由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

《长安史迹研究》是日本学者足立喜六研究长安旧迹的一部专著。1906年至1910年，足立喜六利用自己在陕西的高等学堂任教之闲暇，对西安附近的历史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时结合



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对汉唐尺度里程、汉唐帝陵、汉唐长安城及长安附近的名胜古迹、道观、寺院、古代碑石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究之后撰成此书。本书还原了20世纪初西安所存的长安史迹原貌，书中有著者实地拍摄的照片170张、亲手绘制的插图38幅，其中不乏今已散佚的文物，不仅使图书内容更加生动丰富，也使本书成了研究长安历史文化仅存的清末史料，对于普通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长安之春》的原著者石田幹之助先生是日本著名史学家、汉学家，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文学博士。早年曾来中国游历，长期从事唐代文化特别是唐都长安的研究，本书就是石田先生的研究心得之一。共收录《长安之春》、“胡旋舞”小考》、《当垆的胡姬》、《西域胡商重金寻宝》、《再谈胡人采宝记》、《胡人买宝记补遗》、《隋唐时期传入中国的伊朗文化》、《长安盛夏小景》等八篇文章。本书看似是各自独立成篇，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围绕“唐代长安文化交融”之主题展开的专题研究，内容考证翔实，通篇语调欢快，书后附有研究地图。可以说，就是这部书，让广大日本人民对

古代长安也对今天的西安心驰神往。

《长安》的作者佐藤武敏博士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史专家,本书是他通过对长安都城多年细致研究,最终形成的长安都市史的力作,代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学界中国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准。本书共分为汉以前、汉、唐等三个部分,全面而翔实地论述了长安周围的地理环境、历代城市设施以及行政制度、人民生活等,书后附有相关年表和索引。本书对研究长安都城历史、长安都城地理环境及汉代、唐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长安的都市规划》是当代日本著名学者妹尾达彦教授的一本21世纪初研究长安的代表作。这部著作从全球化的视角,把唐代长安城放到欧亚大陆及世界文明发展史中重新审视,对8—9世纪欧亚大陆上的三座王都——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和长安诞生的历史、城市结构和文化特色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又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唐长安城的结构、生活情境,将长安城定义为一座宇宙之都、生活之都和人文之都。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妹尾先生依据史料绘制了大量准确的插图,省去了大量的文字描述,语言上采用文学笔调来叙事,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本书的出版,对古代长安文化的研究、以后西安地域文化的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具有重要作用。

《唐代长安镇墓石研究》共分为九章。本书是日本著名学者加地有定先生对长安周边及黄河流域出土的唐代镇墓石进行探访、考证以及探索其所含道教文化的研究成果。中国国内至今尚未有镇墓石研究方面的专著,本书可谓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一般认为,镇墓石是始见于唐代墓葬的一种随葬物品,共有五方,其颜色各对应一

个五方色,在墓室中依照方色对应的方位摆放。如何来理解它的出现以及在丧葬中承担的功能或作用?该书便是一部试图对此解答的专著。

《秦陇纪行》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加地哲定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北京访学的4年期间,在中国多地徒步考察时的真实记录之一。这本日记形式的游记,详细且真实地记录了作者90多年前,1925年5月23日至8月8日,从北京出发,途经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等地,再回到北京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与当地人交流的情况,描绘了城市、农村风景,记录了景点名胜,也记录了黄河的惊涛骇浪,是亲身体验的朴素的记述,也是当时中国的真实写照。本书对于当今的年轻学者们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农业、工业、社会状况,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从字里行间也可以了解一位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热爱,有利于促进中日文化的友好交流。

《长安——绚烂的唐都》由日本京都文化博物馆组织编纂,是1994年为了纪念日本平安京建都1200周年而举办的“大唐长安展”的学术论文集。日本京都文化博物馆当时组织了八位有影响力的汉学家,针对展会上展出的从中国借入的精美大唐珍宝,如唐墓壁画拓本、《开成石经》拓本、唐代墓志拓本、法门寺茶具等,发表了精彩绝伦的演讲,深入解读了文物背后反映的唐代长安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外交等情况,重点探讨了日本遣唐使从大唐吸收的城市建设、政治制度、先进技术、佛教等灿烂的文化。

日本学者对长安的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形成了老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以平冈武夫为代表的老生代作者的作品影响甚广,本套丛书集中展现了中生代、新生代长安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 ◆《黄帝世系及其神话传说研究》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刘晓博士的新作《黄帝世系及其神话传说研究》一书,2021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刘晓系文学博士,他的研究方向主要为先秦两汉文学、中国古代神话、中国传统文化等,已出版专著《史记尚义研究初探》,先后在《学术交流》《理论月刊》《中国学论丛》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记忆附加与黄帝人文始祖传说的形成》《神化先祖与黄帝神话叙述的形成》《炎帝、赤帝、神农神话的生成语境与历史整合》等相关论文。

作者多年来持续关注黄帝神话传说的形成问题,为本书奠定深厚的文献基础。全书分为六

章:黄帝世系形成的制度动因、黄帝世系的文献整合、黄帝共祖地位的追述、黄帝神话传说的累积、黄帝形象的多元塑造和两汉谶纬文献中的黄帝形象。

本书取用先秦文献的记载,对照传世的史料,结合考古的发现,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进行谨慎的推断、讨论,以期获得对黄帝世系之祖、族群共祖地位和有关制度更为恰当的研究,解决单纯的黄帝研究与单纯的制度研究所忽略的一些问题。对文学研究来说,以历史、考古、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材料解读黄帝及其神话传说,能够多角度、跨学科地讨论其形成背景,拓展黄帝研究的思路,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